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研究丛书

庄国土 主编

菲律宾殖民当局 的对华政策

(16—17世纪)

Philippine Colonial Authorities' Policies
toward China from 16th to 17th Century

陈丙先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对华政策

(16—17世纪)

Philippine Colonial Authorities' Policies toward China from 16th to 17th Century

陈丙先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 | 国家一级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对华政策：16—17 世纪/陈丙先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5

(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5-5495-1

I. ①菲… II. ①陈… III. ①对华政策—研究—菲律宾—16 世纪~17 世纪
IV. ①D822.3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4849 号



官方合作网络销售商: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总编办电话:0592-2182177 传真:0592-2181253

营销中心电话:0592-2184458 传真:0592-2181365

网址:<http://www.xmupress.com>

邮箱:xmup@xmupress.com

厦门大嘉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0.75 插页:2

字数:340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4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菲律宾这个隔南中国海相望的邻邦,由于地处东南亚边缘地带,且在历史上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所以相较于东南亚其他地区,这个群岛在前殖民时期同中国的交往相对来说不太密切。西班牙人入主菲岛后,带来大量美洲白银。由于白银在中国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菲律宾的美洲白银对中国商人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同时精美的丝货、瓷器等各色中国商品又为菲岛的西班牙人所喜爱,还被他们转贩美洲等地,因此以美洲白银交换中国商品为主要内容的菲中贸易蓬勃发展起来。随着贸易联系的加强,菲(西)中在政治、文化领域也交往频繁。对西治前期(16—17世纪)的菲(西)中关系进行全面探讨,深入研究东西两大帝国如何在东亚地区进行互动,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意义,或许还能获得某种历史启示。

为了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菲(西)中关系,还原历史真相,本书选择该时期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对华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在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菲律宾殖民当局在菲(西)中交往中所奉行的政策内容进行全面阐述的基础上,进而深入系统地探讨各项政策出台的背景与过程,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各种因素,政策执行的效率等,将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横向的国际交往结合起来,从历史时空的二维角度展示该时期的菲(西)中关系。

在对前殖民时期的菲中关系,西班牙人东来前的对华认知,西属菲律宾殖民政权的建立过程等背景因素进行简单的历史回顾后,本书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来研究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对华政策,着重阐述不同时期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对华政治态度及其对在菲华人的安全防范,并分析各种不同态度下的菲(西)中官方交往;阐述菲中贸易的重要性以及菲律宾殖民当局对该贸易所持的政策,并分析影响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阐述西班牙托钵修士传教中国的热忱,对华武力传教的主张,与葡萄牙耶稣会士的传教策略分歧,在中国礼仪之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简要分析和归纳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对华政策特点,探究其对华政策与菲中关系的内在联系。

总 序

庄国土

东南亚是我国重要的周边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扼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交通要道,战略地位重要,近代以来一直是大国争斗要地。东南亚和中国有长期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汉唐以降,两地商人、使臣往来络绎于途。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后,东南亚相继沦为殖民地和列强的势力范围,中国也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和中国先后独立,各自在维护主权独立和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取得重大成就。20世纪70年代以来举世瞩目的“东亚经济奇迹”,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东南亚和中国的崛起。

近代以来,中国和东南亚共同的命运、山水相连的近邻、全球化推动下的区域资源最佳配置和基于相近的价值观,使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密切合作已是水到渠成。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2002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东盟十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2003年,中国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第一个明确支持《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并与东盟双方确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由对话关系上升到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东盟关系的升华,由此开启此后的“黄金十年”睦邻合作。十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进入全面合作与发展的新阶段,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在2002年至2012年,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贸易额从547.67亿美元增至4000.93亿美元,增长6.3倍。双方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在

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中国—东盟贸易额创历史新高,突破 40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2%,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幅(6.2%)。中国连续四年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继续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规模也日益扩大,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更是飞速增长。至 2012 年底,双方相互投资总额累计达 1007 亿美元。中国在东盟还建立了多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如泰中罗勇工业园、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越南龙江工业园、越南中国(海防—深圳)经贸合作区。东盟国家一直是中国重要的海外承包工程市场和劳务市场。至 2012 年底,中国在东盟工程承包签署合同额达 1478.7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970.7 亿美元。比经济合作更为重要的是人员交流。2012 年,双方人员往来超过 1500 万人次,其中,中国赴东盟游客 732 万人次,较十年前增长 2.6 倍,是东盟第二大游客来源地。而东盟各国则成为中国公民的最主要旅游地。中国在东盟的留学生超过 10 万人,东盟在中国的留学生也超过 5 万人。此外,中国与东盟在政治、安全、海洋、环保等方面的合作日益深化。2002 年 11 月,中国同东盟国家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显示了双方共同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维护南海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决心。2011 年 7 月,中国与东盟国家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指针达成一致。2013 年 9 月,双方在苏州开始《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

2013 年 9 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致辞,将中国—东盟过去十年的合作成就形容为“黄金十年”,并表示双方有能力创造新的“钻石十年”。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相继访问东南亚国家,提出与东盟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对夯实与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利益基础与纽带,开启中国东盟合作“钻石十年”具有极其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诚然,中国与东盟关系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南海争端。我的看法是南海争端被过多关注和夸大。首先,南海争端是殖民时期的遗留问题,并非东南亚国家独立以后出现的新争端。中国与相关国家完全有能力在双边会商的基础上解决争端。其次,南海争端是中国与其南海邻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海域划分和相关岛屿归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中国与相关南海主权声索国可本着“搁置争议、共

同开发”的原则,不必急于一时解决。再次,由于当事国各方的节制,南海争端并不比以前更激烈。1988年以来,没有发生过军事冲突,各方都期待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南海行为准则”的协商也在中国与东盟之间进行。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伙伴关系将排除各种干扰而加速推进。我要强调的是,广西将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南亚山水相连、血脉相通的省份,是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在中国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这也是从2004年起每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及广西作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区唯一落户省份的原因,由此也使广西成为中国和东盟合作与发展的主要平台之一。但如何真正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带头羊、引领中国的东南亚战略,是广西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

中国领导人最近提出,中国期待与东盟合作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在21世纪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新战略中,广西责无旁贷。中国传统海上丝路的起源地,就在北部湾东北部的现广西合浦县。合浦离南宁176公里,距北海市28公里。这是《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也是中国最早的中国商人携带丝绸经海路前往印度洋的记载。海上丝绸之路自此开张。现在海上丝绸之路要推动的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广西是唯一与东盟山海相连的省份,海通陆也通,广西理应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东盟合作的重大发展战略,其论证和实施需要顶层设计,而深度解读东盟是前提。有幸的是广西政府能高瞻远瞩,在广西民族大学设立东盟学院,并将广西第一批八桂学者中,唯一的文科八桂岗位“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研究”落户于东盟学院,委以深度研究东盟和培养高端东盟事务人才之重任。

近两年来,东盟学院几近从空白开始,在学科建设、资料建设、咨询服务、国内外交流平台、科研队伍建设方面已经有初步成效。到现在拥有三个学科和数十个硕士生规模,有国内独树一帜的信息员队伍,取得包括省部级以上项目、论文和咨询报告的科研成果,获得新华社、国务院侨办、中国—东盟中心的好评,有几份报告送呈政治局书记处,并得到采

纳证明。

东盟学院八桂学者团队深度研究东南亚的部分学术成果,以《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丛书》出版,本书即是该项目的成果之一。这些研究成果基于作者数年乃至十数年的研究积累,可谓发前人之未发。虽然各书作者学力所限,当有各种疏漏,本人作为主编,当负全责,但本人仍期待读者,关注各书体现的创新性,包括分析的创新和资料的重新。

八桂学者 庄国土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
2014年12月31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1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4
三、研究内容、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19
四、关于研究时段的说明	21
第二章 菲(西)中关系的历史背景	22
第一节 前殖民时期的菲中关系	22
一、菲中官方交往	22
二、菲中民间贸易	30
三、菲中文化交流	34
第二节 西班牙人东来前的对华认知	35
第三节 西属菲律宾殖民政权的建立	40
第三章 对华政治态度	46
第一节 企图侵华	46
一、侵华企图产生的背景	47
二、各种侵华计划与主张	57
三、侵华企图失败的原因	64
四、16世纪后期的菲(西)中官方交往	71
第二节 对华防范与交好	86
一、对华政治态度转变的原因	86

二、对华防范与交好·····	93
三、17 世纪的非(西)中官方交往·····	102
第三节 防范在菲华人·····	111
一、对华人的经济依赖·····	111
二、主要防范措施:限制入境、驱逐与屠杀·····	113
三、辅助性防范措施:压榨、限制与同化·····	121
第四章 对华贸易政策·····	133
第一节 对华贸易的重要性·····	133
一、依赖中国的消费品和军需品出口·····	134
二、依赖中国的丝货出口·····	139
三、西班牙人对菲中贸易重要性的认知·····	146
第二节 对华贸易的影响因素·····	148
一、重商主义·····	149
二、西班牙海外殖民的宗教目的·····	152
三、菲律宾的战略地位·····	158
四、葡萄牙人的贸易竞争·····	159
五、美洲西班牙商人及塞维利亚商人的贸易竞争·····	170
第三节 对华贸易的政策目标·····	179
一、巩固货源·····	179
二、保证市场·····	191
三、追求贸易利益最大化·····	204
第五章 对华传教政策·····	217
第一节 热心皈依中国·····	217
一、视中国为最理想的传教地·····	218
二、入华传教遭遇的各种阻扰·····	228
三、入华传教所取得的成就·····	241
第二节 企图武力传教·····	247
一、政教合一的殖民政权·····	248
二、武力传教的争议·····	259
第三节 传教策略分歧与中国礼仪之争·····	266

一、葡萄牙耶稣会的对华传教策略	266
二、西班牙托钵修会的反对意见	277
三、中国礼仪之争	284
第六章 结 论	294
一、政治现实主义	294
二、经济实用主义与地方主义	295
三、文化欧洲主义	297
四、各项政策相互关联	297
参考文献	299
后 记	317

第一章

绪 论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菲律宾群岛隔南中国海与华南相望,隔巴士海峡与台湾相望,是我国的近邻。在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史中,菲律宾群岛算是比较特别的。该群岛虽与中国邻近,但处于东南亚地区的边缘地带,且在前殖民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并在东洋航线开辟前处于南海传统商路的末端,既没有凸显地理上的优势,也缺乏对中国商人的吸引力。所以相较于东南亚其他地区,前殖民时期菲律宾同中国的交往不是太密切,在中国史籍中留下的相关记载也不太多。

尽管如此,在西班牙人人主前,菲中之间已有近六百年的交往史。据中国史籍记载,菲中交往的首次记录见于宋太平兴国七年(982)。此后,据宋、元、明三个朝代的诸多典籍记载,宋初至明前期菲律宾地区与中国一直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首先,在这一时期,由于菲岛发展滞后,除了苏禄地区的珍珠外,没有太多高价值的产品用于交换,所以,尽管每年有中国商船定期前往贸易,但贸易的规模不大。其次,这一时期官方层面的朝贡贸易和宗藩关系却很显著,中国典籍的记载也更为详尽。如宋咸平六年至大中祥符四年(1003—1011)菲律宾古(邦)国蒲端曾五次遣使前来中国,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1368—1424),菲律宾古(邦)国吕宋、合猫里、冯加施兰、古麻刺朗、苏禄等先后十五次遣使到访中国,并有多次由国王或首

领亲自率团来访。^① 这些前来的使节携来大量贡品,以换取中国朝廷的丰厚回赐,并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当然,这种官方交往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关系的实质,往往以“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②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中国与菲律宾的一些古(邦)国间维持着友好的官方交往,这一点毋庸置疑。再次,在前殖民时期,由于中国文化相对强势,众多的中国文化因子传入并扎根于菲律宾文化之中,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输出者。最后,由于这一时期菲律宾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相对落后于中国,对中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和文化依赖,所以这一时期的菲律宾人往往以一种仰慕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和中国人。在古(邦)国三岛,连到过中国的本地人都能享受很高的礼遇。网巾礁老人则“见华人舟,蹙然而喜”。

1571 年西班牙殖民者攻占马尼拉后,吕宋、冯嘉施兰、合猫里、猫里务等菲律宾中、北部古(邦)国先后消失,除了南部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外,菲律宾群岛的其他地区都成了殖民地,成为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自西班牙殖民者占领菲律宾直至 17 世纪末,西属菲律宾同中国交往频繁,但相较于前殖民时期,这一时期的中菲关系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经济联系紧密。由于菲岛甚至是西属美洲对中国商品的依赖,菲岛经济发展对中国商人和劳工的依赖,中国对美洲白银的巨大需求,菲岛能给来自中国沿海省份的移民提供一个相较于祖籍国更宽松的谋生环境,使得以美洲白银交换中国商品为主要内容的菲中贸易蓬勃发展,尽管时有起伏,但相较于前殖民时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大为提升。同时,随着菲中贸易的发展以及西班牙人对菲律宾群岛开发的深入,大量中国移民以商人、工匠、劳工等身份前往并留在了菲律宾,虽然由于屠杀与驱逐之故,有时数量起伏较大,但总体上还是远超前殖民时期。其次,与经济上的紧密联系相反,这一时期菲(西)中间的政治关系则出现了倒退。西班牙殖民者人主菲律宾后,菲律宾殖民当局实为西班牙帝国的地方政府,尽管菲督有权

^①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中国古籍中有关菲律宾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2 页。

^② 庄国土:《略论朝贡制度的虚幻:以古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为例》,《南洋问题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3 页。庄国土教授认为,“很多东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与东南亚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与宗藩关系’,实际上并不具备‘朝贡’和‘宗藩’的实质。将到中国者统称为朝贡者,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及历代史官、文人的一厢情愿”,“朝贡是贸易的外衣”。

派遣或接待来自亚洲国家的外交使节,可以和亚洲的统治者签订条约或向他们宣战,近乎行使一个君王的权力和特权,^①但毕竟只是西班牙国王的代理人。这一时期菲中间的官方交往都在中国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的地方政府与菲律宾殖民当局之间进行,菲律宾殖民当局与中国朝廷之间以及中国沿海省份的地方政府与西班牙王室之间都没有发生过直接联系,中国朝廷与西班牙王室之间更是没有,所以在官方交往的层级上出现了倒退。更重要的是,与前殖民时期一贯友好的官方交往不同,这一时期菲(西)中间的官方关系不时出现紧张,甚至剑拔弩张。再次,与前殖民时期中国文化大量输入菲律宾相反,西班牙殖民者入主后,菲律宾迅速被天主教化和西班牙化,成为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输出天主教信仰的基地。尽管这属于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部分,这种交流不仅有“西学东渐”,也有“东学西渐”,但对于本身位于东方的西属菲律宾来说,中国文化的输入多在前殖民时期就已完成,这一时期更多的是向中国输出天主教文化。最后,中国与中国人 在菲岛不再受仰慕。虽然经济上十分依赖中国的商品和移民,但 700 年收复失地运动的最终胜利,海外殖民征服的所向披靡,庞大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以及狂热的宗教信仰,自然地形塑了西班牙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优越感,使其傲视其他的非欧洲民族与文明,因此中国及中国人也就难以在政治和文化上受其尊重了。也正是这种当时盛行的欧洲主义让菲岛的民事和宗教当局一而再地叫嚣征服中国,并宣称这种征服是正义而合理的。受害于殖民当局的隔离政策,被天主教化和西班牙化的菲律宾本土民族,也慢慢地从殖民者和西方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在菲华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充当殖民当局迫害和屠杀华人的帮凶。

为什么西班牙殖民者东来后菲(西)中关系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要比较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恐怕需要从各个层面对那一时期的菲(西)中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本书选择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对华政策——主要指其对菲(西)中官方交往、菲中贸易、在菲华人、入华传教等所奉行的相关政策——这一菲(西)中关系的侧面为视角,来透视那一时期的菲(西)中关系。

研究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对华政策,其意义就在于,一方面,通过对政策内容、政策形成的背景和过程、政策执行的效率等方面的研究,从一个侧面

^① 格雷戈里奥·F. 赛义德著,吴世昌、温锡增译:《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54页。

展示那一时期的菲(西)中关系,为还原历史真相,为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略尽绵薄之力。这一领域目前尚属菲(西)中关系研究的薄弱环节,国内外研究成果甚少,或许还能起抛砖引玉之效。另一方面,以菲律宾殖民当局的对华政策为主线,来展示东西方两个具有异质文明的强大帝国相遇后所进行的互动过程与模式,两大文明交汇后所发生的碰撞在各自人民之间所产生的心理震撼和文化认知,但求能为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具有异质文明的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交往,提供某种启示。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早在 16 世纪后期,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帝国西班牙征服了菲律宾中北部地区,并建立了全面的殖民统治,从而与中华帝国相比邻,时达 300 多年。那一时期的中菲关系成为许多中外关系史、东西文化交流史、菲律宾史、东南亚史乃至明清史学者关注的重要内容,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已有很多相关的专著、论文出版,史料也很丰富。不过,由于很多时段的文献记载不足或缺失,该时期的中菲关系研究难度很大,所以很多该领域的研究成果都缺乏深度和广度。

(一)外国学者的研究^①

国外学者对西属时期菲(西)中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研究者的地域分布逐渐扩大、研究层次不断提升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

1. 西班牙统治时期

在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 300 多年间,国外有着大量关于西属时期菲(西)中关系的记载或著述。不过,那些记载或著述绝大多数出现于西班牙帝国版图内,这不仅因为西班牙帝国是该时期菲(西)中关系的当事方,马尼拉开港前西班牙在菲律宾实行的封闭性政策,即规定菲律宾除了与墨西哥及西班牙母国进行纵向联系外,不得与其他西方殖民国家进行直接交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该规定使得其他西方人很少有机会进入菲律宾,去了解该时期的菲中交往。作为旁观者,与西班牙在东亚舞台上进行角逐的其他西方殖民国家,如葡、荷、英、法等,还是留下了不少该时期菲(西)中交往的记载。

^① 本书将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学者也归入国外学者的行列。

(1) 西班牙人的相关记载或著述

西班牙人对西属时期菲(西)中关系的记载或著述,基本上都出自菲律宾的殖民官员与传教士之手。这主要是因为菲华人文化程度较低且专注于生计,而土著又文化程度太低且视野有限,使得著书立说的文字工作长期以来都局限于少数上层殖民官员和传教士范围内。其中,又由于传教士的文化修养相对较高,更有能力进行记载和著述,所以在整个西属时期,“几乎所有有关西班牙在菲律宾殖民统治的著作都来自于各修会的传教士”。^①

西班牙人有关西属时期菲(西)中关系的记载或著述,主要以王室法令,殖民官员的报告、书信或著作,以及传教士的著作、书信或日记等文献形式出现,或载于其中。由于西班牙王室的法令、殖民官员的报告或书信以及传教士的书信或日记等文献,往往记载的内容比较单一且狭隘琐碎,记述又就事论事而缺乏深入分析,虽为珍贵史料却学术价值不高,且数量庞大,内容与形式繁杂,难以进行分类概述,所以本书在此仅就传教士的相关著作,也包括极少数殖民官员的著作,作一个简述。

第一部叙述菲中交往的著作为马丁·德·拉达(Martin de Rada)的《中国纪行》,其第一部分主要叙述德·拉达一行出使中国的经过。拉达神父是第一位亲历中国的西班牙传教士,^②返回马尼拉时捎回了百余种中国典籍。在参考所捎回典籍的基础上以其亲身经历撰写的《中国纪行》,可信度高,后来与那些典籍一起成为西班牙奥斯定会传教士门多萨(Gonzalez de Mendoza)撰写《中华大帝国史》(*History of the Great Kingdom of China*)的宝贵资料。得益于此,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年于罗马出版后,成为当时影响欧洲人中国观念的经典之作,也是关于西属初期菲(西)中关系的重要著作。1604年出版于罗马的耶稣会士皮德罗·季里诺(Pedro Chirino)的《17世纪的菲律宾》(*The Philippines in 1600*)一书,虽其主要篇幅是叙述耶稣会在菲律宾的传教状况,其中也包含作者本人在华人中传教及学习华文,耶稣会士对华人施加巨大影响等内容。1609年出版

① C. R. Boxer, *Some Aspects of Spanish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Philippines*, in D. G. E. Hall edited, *Historian of South East As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00.

② 本书将会多处出现“西班牙传教士”、“西班牙托钵修士”之类的称呼,都是指经由西班牙海外属地前来,特别是受西班牙王室资助,承认西班牙王室保教权的传教士,其中绝大多数来自西班牙,有些则来自其他国家。

于墨西哥的莫加博士(Antonio de Morga)所著的《菲律宾纪事》(*Sucesos de las Filipinas*)一书,涵盖了 1493—1603 年间菲律宾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就包括了华人问题与中菲贸易增长情况。由于莫加曾在 1595—1603 年间任菲律宾最高法院院长、代理总督,这不仅使他有可能会接触到西班牙政府的档案,而且还成为一些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所以该书是基于其文献研究、个人观察及自身经历撰写而成的,记载相对客观真实,如作者坦承,如果没有殖民者的野蛮行径也就不会激发 1603 年的华人暴动,从而使该书成为西属时期菲律宾殖民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对今天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① 麦蒂那(Juan de Medina, O. S. A.)撰于 1630 年,后于 1893 年在马尼拉出版的《菲律宾奥斯定会史》(*History of the Augustinian Order in the Filipinas Islands*)一书,其中以一定的篇幅谈到了中菲贸易的利润丰厚以及某些官员辞公职而从事中菲贸易,中菲贸易的起始与发展,以及早期奥斯定会士赴华传教企图失败等内容。^② 1736 年艾伯茹(Antonio Alvarez de Abreu)撰于马德里的 *Extracto Historial* 一书,回顾了自起始至 1640 年间菲律宾与新西班牙之间的贸易,其中涉及贸易争端,王室的限制政策,特别是对中国丝织品的限制等内容。在该书的第三部分至最后,主要叙述 1640 年至该书成书时那一段内,在菲律宾、墨西哥与西班牙母国三方的博弈下,西班牙王室对菲墨间贸易的政策摇摆不定。^③ 因为菲墨贸易是中菲贸易的延伸,前者的任何波动都会直接影响到后者,所以该书也应被视为涉及西属时期中菲关系的重要著作。阿杜阿特(Diego Aduarte)1640 年在马尼拉出版的《多明我会圣玫瑰省传教史》(*Historia de la provincia del Sancto Rosario*)一书,记载了西班牙远征东亚前半个世纪的传教情况,其中在该书第一册的第 1 至 9 章谈到了在中国开教的失败,第 10 章则谈在马尼拉华人中的传教。^④ 1693 年在萨拉戈萨出版的克鲁斯的(Baltasar de Santa Cruz, O. P.)《历史》(*Historia*)一书,叙述了菲律宾多明

① B. L., Review: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 Islands from Their Discovery by Magellan in 1521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XVII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39, No. 8 (1907), pp. 510~511.

② E. H. Blair and J. H.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1493—1898, Cleveland, The Arthur H. Clark Co., 1903 (下文简称 BR), Vol. 23, pp. 14~15.

③ BR, Vol. 44, pp. 18~22.

④ BR, Vol. 30, pp. 12~13.